

# 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中国大学 政治文化变迁机制研究

周 琴 王卓君

**内容提要** 大学政治文化是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构和功能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主导政治文化。遵循“狭义心理观”视角,大学政治文化可以界定为大学内部参与主体在政治系统和自身运行方式的双重影响下,履行其社会角色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中国大学政治文化的变迁遵循着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政策法规变迁,并在两者互动作用下导致高校管理体制的适应性调整和变革,进而决定着大学功能定位的选择和强化,由此影响大学内部各参与主体的角色认知和责任履行。而参与主体自身角色的认知又决定其在特定政治生态、政治体制下的卷入方式和卷入程度的演变,由此导致中国大学政治文化的产生变迁。

**关键词** 政治文化 中国大学政治文化 变迁机制 结构功能主义

周 琴,苏州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215100

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 210029

王卓君,苏州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15100

对于现代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文化概念,学者们倾向于追溯至1956年由阿尔蒙德最早提出。他认为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蕴藏于某个塑造政治行为的特殊模式之中,这种特殊模式反映的就是政治文化<sup>[1]</sup>。然而政治体系本身不可能是完全同质的,因此政治亚文化的存在是一种必然现象。派伊等认为,没有一个社会存在一个一致的政治文化,所有社会在统治者或权力持有者的政治文化与大众政治文化之间存在明显差异<sup>[2]</sup>。甚至“无论是多么发达或多么落后的社会,其政治文化不可能是清一色的,特别是随着现代全球政治、经济剧烈的相互渗透,更是使各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充满了异在的诸多因素。于是,政治文化研究者们借用了文化人类学中另一个重要的概念亚文化来分析社会政治文化的构成”<sup>[3]</sup>。

政治亚文化不仅会在特定人群中出现,在特定的组织中(如大学、社会团体、企业单位等)也将同

[1]Almond. A.G.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56(3): 391- 409.

[2]Pye.L.W., Verba,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3]王卓君:《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政治文化研究引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样存在。这些组织在特定的外部宏观环境(如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内在微观因素(如组织目标、组织文化等)影响下,成员们会形成带有其自身机构运行特征的政治价值态度、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其中大学政治文化是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构和功能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主导政治文化。中国大学除履行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三大职能外,还一直承担着青年学生政治教育的任务和使命。因此,以大学政治文化为研究对象,界定其概念,并借助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框架,揭示中国大学政治文化的变迁机制,不仅在理论上可以拓展本领域的研究视域,现实上对把握我国大学内部参与主体的政治心理和情感变化和发展也有很强的指导价值。

## 一、大学政治文化的概念提出

国内外学者依据不同分析视角,对政治文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阐释。总体上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认知、情感和评价三个基本要素为框架界定政治文化的“狭义心理观”;第二类是从政治思想角度来定义政治文化的“中义思想观”;第三类是将政治制度纳入政治文化研究的“广义系统观”,其中第一类的“狭义心理观”主要被西方学者所倡导。派伊认为“政治文化是一套态度、信念和情感,它赋予政治过程以意义和秩序,它给出制约政治系统行为的基本前提和规则,它包括政治思想和一个整体的运行规范。因此,政治文化就是政治的心理与主观维度整合而成的。一种政治文化既是一个政治系统的集合史,又是这个系统中的成员的生活史的产物,因而它深深地根植于公共事件和个人经历之中。”<sup>[1]</sup>阿尔蒙德和鲍威尔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sup>[2]</sup>普拉诺也坚持类似观点,他在《政治学分析词典》中指出,政治文化是每一个社会中由学习和社会传递的关于政府和政治行为模式的信息合成。政治文化通常包括政治心理和行为因素,如观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政治文化既是全社会历史经验的产物,也是每个人社会化的个体经验与能力<sup>[3]</sup>。

大学政治文化反映为以特定组织机构——大学——为载体的政治亚文化。一方面相比于社会的其他组织,大学内部各类参与者总体上呈现学历层次高、民主参与意识强、自我发展动力足等特点;另一方面大学从事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工作,受到科学性、规范性的约束。同时学术探究工作具有不可预知性、思维发散性、过程严谨性等特征,从而导致权威主义的非绝对化、学术共同体的自治。故而大学师生员工对政府活动、党派信仰、公民意识、公民能力、政治参与等环节的认知和评价将会更为深刻,富含菁英文化的蕴义。由此我们倾向于“狭义心理观”视角,将大学政治文化界定为,大学内部参与主体在政治系统和自身运行方式的双重影响下,履行其社会角色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评价。

## 二、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对大学政治文化变迁的解读

大学政治文化是大学内部各参与主体在心理、情感层面对政治体系和自我在政治体系中作用的认知和评价。作为内隐式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反应,它的发展和变迁不仅与成员个体的性格特征、思维能力、成长动机、行为倾向紧密关联,同时还会受到来自外在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其中包括政治系统、文化系统等子系统,也包括政府、大学等各种组织的子系统。不同子系统在

[1]Pye. L.,W.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Macmillan Co. and the Free Press,1961(12): 218.

[2][美]阿尔蒙德,G.A.,鲍威尔,G.B.:《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3][美]普拉诺,杰克:《政治学分析词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社会大系统中处在特定的结构中,也由此扮演着各自功能、角色。

政治学领域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来源于由生物学发展而形成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它以政治系统内部的结构和功能作为分析对象,结构是政治行为模式即政治角色的组合,功能是结构所产生的特定影响。按照政治系统、过程和政策等不同层次,分析政治结构和功能的相互作用关系,试图由此说明政治系统运行的状况和规律<sup>[1]</sup>。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方法最早出现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后来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又将结构-功能的概念和方法引入社会科学研究范畴,从此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分析框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在其《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从个人层面分析有目的和有意图的社会行为的主客观内外条件,从而开创了从微观角度考察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同个别行动者行动的相互关系的思维模式<sup>[2]</sup>。帕森斯认为个体的动机可以分为认知的(对信息的需要)、情感的(对感情寄托的需要)和评价的(对好恶的需要)三种,继而个体的价值观也可分为认知的(按照客观标准进行评价)、鉴赏的(按照审美标准进行评价)和道德的(按照绝对正误标准进行评价)。动机和价值观决定了个体行动的取向,任何个体的行动目标也存在三种不同类型:工具性的(行动定位于有效地实现既定目标)、表意性的(行动定位于实现情感上的满足),和道德性的(行动定位于非标准)。个体行动者根据最强的动机和价值观出发,采取以上三种行动模式。当不同取向的行动者互动时,便产生了约定,得以维持约定的互动模式,由此产生了“制度”,而制度化的模式就是社会系统<sup>[3]</sup>。

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之所以能够维持,主要是人格系统和文化系统被整合到了社会系统之中。这种整合保证了规范的凝聚力以及行动者遵守规范和扮演角色的基本责任感。整合存在两种机制,一种社会化机制,一种是社会控制机制。社会化机制将文化模式(价值观、信仰、语言和其他符合)内化到人格系统,进而制约其需求结构。通过这一过程,使行动者愿意把动机的能量施加于角色中,并给与角色必须的互动技能和其他技能。社会化机制还提供了稳定和的安全的人际纽带;而社会控制机制是减少互动过程中紧张、焦虑、冲突和摩擦的、被组织起来的方式<sup>[4]</sup>。帕森斯的社会系统整合机制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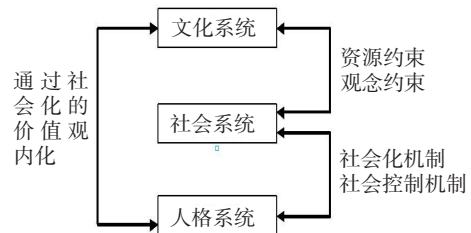


图1 帕森斯社会系统整合机制图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模式不仅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对政治学的影响也尤为深远。阿尔蒙德、鲍威尔、阿普顿和米切尔等人则是政治学领域影响力很大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学者。其中阿尔蒙德的影响力最大,他吸收了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的基本原则,建构了政治学的结构功能分析框架的基本假设:政治系统都是由其内部结构组成的,并且每一政治结构都发挥其特定的功能;所有的政治系统均履行相同的功能,这与履行这些功能的结构性质没有任何关系;所有的政治结构从其履行的功能角度看,又表现出多元化特征<sup>[5]</sup>。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政治学领域研究可以达成系统分析与个体分析之间、截面研究与径向研究之间的两个统一。本研究中,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大学组织是其中的子系统,师生员工是个体化参与者。采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分析框架,就是揭示政治经济制度对大学组织运行、对大学内部参与主体个体态度、价值观、行为的影响机制,考察不同历史时期个体和群体政治信念受宏观影响而发生的变迁过程和未来走向。

[1]王浦劬等:《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上,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4][美]特纳·乔纳森:《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5]张铭、严强:《政治学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三、中国大学政治文化的变迁机制

中国大学政治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呈现出迥异的变迁轨迹。特定的政策体制、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既是中国大学政治文化变迁的宏观背景,也是前因因素。前文将大学政治文化界定为大学内部参与主体在政治系统和自身运行方式的双重影响下,履行其社会角色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那么宏观因素如何借助影响大学参与主体,进而导致大学政治文化变迁的内在机制和逻辑值得剖析,由此才能厘清不同前因因素影响效应与影响层次的差异,以便引导中国大学政治文化在塑造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潮流中得以良性发展,也有助于揭示未来中国大学政治文化的演变趋势。

#### 1. 大学内部参与主体的角色变迁影响着大学政治文化的演变

大学政治文化反映了大学内部参与主体对政治生态、政治系统和学校运行体制的心理评价、情感认知。首先,政治卷入的方式影响政治认知的真实性。王浦劬(2006)根据公民对于政治卷入的行为形态,将政治卷入划分为主动卷入、动员卷入和消极卷入三种。主动卷入反映了公民出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而自发地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动员卷入是公民因受他人鼓动或响应号召而发生的影响政治过程的活动;消极卷入指的是公民出于非自愿的原因而对政治漠不关心或采取反感、敌视,被动抵抗的行为<sup>[1]</sup>。显然主动卷入政治过程的大学教师员工和各类学生,所反映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将是真实的;其次,政治卷入的程度决定政治文化的有效性。个体不受限制的获得政治系统的各类信息,参与到自身感兴趣的政治过程中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判断、评价,才能使得个体做出符合自身风险预期的决策。相反,在不对称的信息环境下,个体出于规避风险的考量,必然会减少进一步政治参与行动;最后,个体角色认知决定其政治卷入的动机。公众卷入政治系统,目的是获得个体或集体利益,这样的利益建构于自身的内在动机和需求满足基础上。保有不同社会定位、责任履行和利益准则的各类社会阶层群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对自身的角色定位、承担使命和责任履行的认知也是不同的。

1949-1965年间,政治运动频繁,包括大学师生员工在内的知识分子需要“转变立场、克服旧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高校要培养“又红又专”人才。1966-1976年间,文化大革命大力倡导“开门办学”,建立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教师队伍,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大学培养目标也转变为“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1977-1992年间,大学逐渐回归其自身发展轨迹。恢复高考、平反冤假错案、扩展自主管理权限、重视科技创新价值。大学人才培养目标也转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and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具有高度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能力,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及其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到了1992年以后,各项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出台和颁布,保证了大学改革发展的稳定推进,政府强调“大学应该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由此激发了各参与主体的热情和动力,大学政治文化发生了新变化。

#### 2. 大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变迁影响着内部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

教师员工和各类学生是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等功能履行的责任人和完成人。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学、或不同层级的大学,由于其自身历史传承、社会期许、战略定位的差异,对大学功

[1]王浦劬等:《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能的选择表现各有侧重。以人才培养为主旨功能的大学对师生员工的使命要求,重在教学,辅以科研和服务;而推崇科研引领的大学,势必倡导科研促进教学的理念。大学功能定位和变迁决定其向教师员工、各类学生传递的价值导向的差异,从而影响这些大学内不参与主体对自身角色、责任和使命的认知和调整。

1949-1965年间,中国大学从建国初模仿苏联管理模式,到1961年出台《高校六十条》,明确高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高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如此大学功能定位决定了教师的根本任务是认真教好学生、完成教学任务。1966-1976年间,从文革初期高校管理权被剥夺、大批专家学者被打倒,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再到1973年《光明日报》发表《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一文,中国大学的功能完全被扭曲,仅仅是名称上的徒有其表,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学校的广大干部、教师和学生受到了严重的思想摧残和职业弯曲,教育工作和学校教育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在1977-1992年间,《新高校六十条》明确界定了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科技工作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主战场的定位,逐渐转变教师、员工和学生对大学功能的认识,从而激发出极大的参与热情和变革动力,广大教师、员工也有机会、有渠道参与到学校管理、科研活动和学术交流之中。1992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入崭新时代。理顺政府与高校关系、高校办学规模扩大、“211”工程、“985”工程、本科专业教育教学水平评估、“2011”计划,以及《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颁布和施行,使得现代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功能在中国大学得以全面确认。在此背景下,我国大学内部各参与主体的角色和使命认知也凝练到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领域,工作热情得以不断提升。

### 3. 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大学的功能定位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社会价值创造的方式和价值创造的贡献评价,简单如农业经济社会中对农业产品的倚赖,区别于工业经济社会中对设备、资本、厂房的侧重,以及知识经济社会中对信息、人才、知识的追逐。因此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时代,不同组织由于其创造价值的手段、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迎合市场需求的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会造成该组织(包括一类组织、行业)赢得优势而得以强化,并不断完善发展。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亦是如此。

1949-1965年间,从建国初的恢复经济、稳定物价、改善生活,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再到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发展大起大落。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部分高校秉承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相继下放地方管理,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要到工厂参加劳动,学校里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越来越多,无法维持正常的教育秩序;1966-1976年间,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严重的社会秩序混乱对中国当时的人力资本也造成了重大打击。1971年出台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强调在进一步调整高等学校管理体制(高校下放管理)的同时,强调要把大学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从而要大搞阶级斗争,大搞政治运动,要对教育领域内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专政;1977-1992年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引发了大量人才需求和技术需求。1978年颁布的《新高校六十条》强调大学要培养“具有高度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能力,掌握本专业的理论基础、专业知识及其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即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要开展科研工作,大学科技工作组织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主战场,“科研成果开始成为衡量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1992年以来,在国民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科学发展等方面的压力问题陡增。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愈发成为中国持续发展的动力

源泉。于是经济发展形势对大学的功能定位提出了崭新要求。“211工程”、“985工程”的实施是为了建设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两项工程成为中国大学建设发展的标杆;“2011计划”的提出,强调“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sup>[1]</sup>。“2011计划”的推行,又将为大学的功能定位和未来发展注入新的涵义。

#### 4. 经济发展与政策法规的互动效应对高校管理体制和大学功能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经济对政治具有决定作用。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平决定了政治体制的运行形态,以及匹配性的政策、法规与之相适应,否则将成为经济发展的掣肘。因此经济发展与政策法规的良性互动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高校教育管理体制的建立和调整是特定历史时期国家宏观管理政策、方针、法规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反映,直接用以调节中国各类大学的定位、建设与运行。

1949-1965年间,出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大部分高校相继下放地方管理。1961年的《高校六十条》则强调“高校应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等原则和制度”;1966-1976年间,国家教育行政机构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即被剥夺了领导管理教育的权力,中央文革小组及其下属的教育组代行教育部和高教部的职责。《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文章和“五七指示”要求所有学校都要培养“能文能武、能工能农,还特别要能批判资产阶级”的人;到了1977-1992年间,改革开放、党政分开的大背景下,高校管理体制逐渐回归本源。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心城市三级办学体制,解决了办学主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扩大了下级政府的办学权。1992年以来,高校管理体制得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纲要》强调“在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上,要按照政事分开原则,通过立法,明确高等学校的权利和义务,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要在招生、专业调整、机构设置、干部任免、经费使用、职称评定、工资分配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分别不同情况,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学校要善于行使自己的权力,承担应负的责任,建立起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政府要转变职能,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规划、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2011年的《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2014年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相继颁布,更加注重完善学校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体制和机制。

综上分析,中国大学政治文化的变迁遵循着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政策法规变迁,并在两者互动作用下导致高校管理体制的适应性调整和变革,进而决定着大学功能定位的选择和强化,由此影响大学内部各参与主体的角色认知和责任履行。而参与主体自身角色的认知又决定其在特定政治生态、政治体制下的卷入方式和卷入程度的演变,由此导致中国大学政治文化的产生变迁。

[责任编辑:天 则]

[1]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1年4月24日。